

收稿日期:2023-10-12

明遗民汤来贺治生抉择之原因探析

潘浩正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与外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明清易代,旧朝遗民不食周粟,在民间自食其力,讲学授徒是比较常见的治生方式之一。江西南丰的明遗民汤来贺,入清后受聘于白鹿洞书院,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业,为书院制定学规。他为清初宣传与推广理学,倡导德治和教化做出了一定贡献。遗民汤来贺成为书院山长,原因主要有:明清时期,朝廷大力修建书院,支持书院发展,这些举措为士人讲学为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汤来贺深受耕读传家的家风熏陶,他对程朱理学的信奉亦指引他走上山长之路,卒后获“文恪”之名享誉江右。

关键词:江西书院;家族遗风;汤来贺;治生方式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1-0078-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南明文学作品全编整理与研究”(19ZDA257)。

作者简介:潘浩正(1994—),女,浙江绍兴人,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1.009

八旗入主中原,一批士人甘为遗民,僻处乡间,明末江西籍进士汤来贺(1607—1688)即为一例。汤氏字佐平,号惕庵,崇祯庚辰(1640)进士,谒选得扬州推官。南明隆武抗清失败后,汤来贺回到家乡南丰,屡次拒绝清廷的为官邀请,最终选择以教师身份行世,出任江西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山长,吸引了众多学子慕名而来听其讲学,名震一时^[1]。汤来贺的人生抉择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江西地区自古以来发达的书院文化,以及南丰汤氏作为地方大族的家族传统等。其人生道路不失为明末遗民的一个缩影,故笔者特将其列出,挖掘江西这一人文渊薮的文化传统与地域特色。

一、江西书院文化的发达与注重文化传承的士人意识

胡适曾在《书院制史略》中云:“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2]71}江西最早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从事教学活动的书院,乃唐宪宗时期设立的桂岩书院^{[3]20-21}。据《江西书院》的统计,唐代江西书院有十二所^{[4]概论2},其中位于德安县的东佳书堂是“我国早期具有教育功能书院初步规范化的标本”^{[3]61}。据清《光绪江西通

志·书院》等史料的统计,自唐至清,江西书院共约940余所^{[5]前言2-3},其中建于宋代的江西书院就多达239所左右^{[5]58,106},远远超出前朝唐代的数量;且从同一时期全国的数量看,江西书院在唐、五代、宋等朝代,“始建数量一直名列全国第一”^{[4]概论10}。北宋时期江西较著名的书院,首推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下^{[3]86-87},此外有南丰书院、南城盱江书院等^[6]。南宋时期江西著名书院有怀玉书院、象山书院、白鹭洲书院、鹅湖书院、豫章书院等^{[4]22-272}。江西书院在明初萧条冷落,但到嘉靖、正德年间,经由王守仁、湛若水等一大批士大夫的大力提倡,江西书院的发展出现新的高潮。明代江西书院共约288所,“与宋代相比,数量亦已超过”^{[5]363}。

自明末以来,书院评论时政的社会功能加强,如顾宪成创立东林书院,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7],书院成为士人抒发个人政见的场所。顺治九年,清廷有令云:“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8]94}到顺治末、康熙年间,清廷逐渐改变抑制书院发展的基本国策,在积极兴办书院的同时不忘加强对其控制与监管,书院才重新蓬勃发展起来。雍正帝更是下令鼓励兴办书院,并在财政方面予以大力支持^[9]。乾隆帝亦积极建设书院,将书院发展再次推向高潮^{[4]概论4}。

虽然清初不允许新办书院,但地方官员多对年久失修的书院进行重建与修葺,挽救低谷期的书院文化。《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第六章《清代江西的书院》第一节《顺治间清廷对书院的控制和江西书院的修复》指出,江西修复书院的活动在顺治十四年之前就已开始^{[5]367},如顺治十年,江西巡抚蔡士英等人相继修筑与维护白鹿洞、鹅湖、白鹭洲等几大江西著名书院,蔡氏宣称:“王道之极大,莫如教养人材,而学校以进身,反成谋利之地;书院以穷理,犹近为己之门;有志者宜何图焉!是故余于江西务尽复诸书院,如鹿洞、鹅湖、白鹭次第修举,最后乃及澹台祠,祠成而北上矣。”^[10]早在顺治四年,蔡士英的下属李长春就下令重修白鹿洞书院,后因金声桓反清,修葺工作不得已而暂停,至顺治七年而重启,后数年又多次修缮,均有史实资料留存,可证白鹿洞书院屡次修葺的事宜^{[11]127-128}。

在士风学风方面,江西明遗民用力颇多,出现了一批如魏禧、宋之盛、谢文游等建馆讲学的士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以遗民节操著称,擅长古文的“江右三山学派”^[12]:一为宁都翠微山易堂学派,以魏禧为首,魏禧与其兄际瑞、弟礼以及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有“易堂九子”^[13]之称;一为星子髻山学派,宋之盛于星子县华林丫髻山下建一草堂,在此讲学,与宋一起讲学者还有吴一圣、余皞、查世球、查辙、夏伟、周祥发等,世称“髻山七隐”^[14];一为南丰程山学派,谢文游(号程山)与同邑生徒甘京、黄熙、曾曰都、封濬、危龙光、汤其仁等人活动于程山学舍,世称“程山七子”^{[15]237-238}。

汤来贺的家乡南丰县便是谢文游等程山七子讲学与活动之地。谢文游作为程山七子的领袖,他早年曾学佛,精研诸家学说,从顺治四年开始专攻王阳明良知之学,教授生徒,多次举办讲学活动。七年后始馆于程山,设尊洛堂,自号约斋。顺治十四年,谢文游读明代罗钦顺之《困知记》,彻底服膺于程朱理学,从此讲学内容亦从阳明心学转变为程朱理学。程山学舍学术活动频繁,康熙四年夏,宋之盛、魏禧均曾造访谢文游,三山毕至,成为当时儒士聚会之盛事^{[16]265-281}。据《江西省志人物志》,谢文游治学道路的改变,“开启清初部分江西学者由专讲阳明心学转而师宗程朱理学之先声”^{[15]238},可知清初的江西学者对道德修养与躬行实践的重视程度,讲学是他们用来传播理学思想最直接的方式。

从江西书院发展史可知,江西书院文化发达,起步较早,在历朝历代的全国书院中江西书院的数量与教育水平均位居前列。从汤来贺所在的南丰县看,明末清初谢文游等理学家倡导讲学之风,当地崇尚儒家实用之学,为士人造就了优良的教育与学术氛围。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大背景下,汤来贺步前代鸿学巨儒之后尘,成为白鹿洞书院的主教者,引领书院更好地发挥其在传播儒

学、传承中华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南丰汤氏讲学授徒的家族遗风

汤来贺家族南丰汤氏，在明末清初亦为地方上较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据《中国文化世家·江右卷》之《隐居耕读·传道受业——明清之交南丰汤来贺世家》的考察，汤氏家族上溯到汤来贺的高祖，下至其子孙，南丰汤氏“明清两代进士十余人，举人四十余人”^{[17]526}，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可见书香门第培育出来的人才之多。

汤来贺高祖汤作事迹见于《民国南丰县志》卷三十一《人物传·善士》：

汤作，字志仁。性严正，子弟衣冠不整无敢见。又仁煦可亲，凡不能举火、婚嫁、延师者，为之区画。西门距城数武，今所谓管家桥者，即宋时朱光禄弑捐金活命阴德树处也。作即地构舍以训子孙，颜曰培亭。世称培亭先生。著有《培亭诗集》。年八十二。子晔，孙邦翰，曾元敬中、裕中、绍中、来贺、来廉、来贲皆其裔也，自有传。^[1]

汤作自建书舍为子孙后代提供读书之所，其家族的重教传统由来已久，故人才辈出。汤作生汤晔。汤晔是汤来贺的曾祖父。汤晔为嘉靖三十一年贡生，亦不仕。

汤晔生汤邦翰。汤邦翰字良雨，号纯斋。性孝友。为嘉靖年间举人。《民国南丰县志》卷二十三《笃行》载其事云：

执亲丧，哀毁过礼。侍祖母疾，衣不解带者三年。两弟无禄，视其子如子，以教以养，给以腴田，俾之成立，而自留其薄者。嘉靖辛酉举于乡，不以一字干当道。将谒选，见守令屈抑不得志，叹曰：“吾不能为此矣！”遂不出。神、光二庙升遐，邦翰以国变迭兴，率子孙哭于家。年九十卒。督学侯峒曾采舆论，祀乡贤。^[1]

汤来贺祖父邦翰孝事父母，视侄子如己出，在他身上表现的是仁慈纯朴的儒者风范。他中举后目睹其他为官者抑郁不得志，故未曾谒选便决心不仕，不改乃父作风，隐居读书数十年，这潇洒的气概与专注的态度非常人所有。汤邦翰著述丰富，有《家礼辑要》二卷、《衍义要览》二卷、《近思录约旨》一卷、《诸儒语录纂》二卷^[1]。从这些书名可见其对儒学的推崇，以及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汤邦翰生三子，第三子为汤绍中。汤绍中字渔公，号恪素，崇祯十六年进士。《同治建昌府志》卷八之七《人物·孝友》亦见其生平概略：

性至孝，事兄敬中、裕中如严师。平生懿行，无问乡里。崇祯癸未成进士，时馆选限五十以上者不得与，或劝绍中减年以应，绍中不可。^[18]

汤绍中进士后，按明朝选官制度，年过五十岁不能被选任庶吉士，在当时常常有人虚报年岁以任官的情况下，汤绍中并没有亦步亦趋，弄虚作假，其品行正直可见一斑。后汤绍中“授行人。明年即家起礼部主事，不就。优游林壑，自号长潜山人”，最终选择在山林间隐居度日，至八十六岁高寿而卒，被祀忠孝祠。著有《大易注抄》^[18]。

汤绍中之妻黄氏是举人黄宪中之女^[1]，系大家闺秀，对汤氏家风的树立亦有功焉。据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三十《先母黄夫人行状》记载^{[19]293-295}，黄氏“秉性直方，少时训子甚严，深得正家之道”，持家谨严忠孝，继承汤绍中母亲李氏治家之法。汤来贺中举人后，有邻人手持钱币丝帛前来向汤来贺示好。黄氏抚帛三叹曰：“千丝万缕，积劳苦而成。今尔以一笔得之，能自安乎？取利而佐阙长，争讼而坏风俗，非细过也。尔祖登科六十载，未尝以一札干郡县。尔幸获此步，遂欲效世俗乎？亟还之。”后汤来贺任官扬州，将一些衣服和丝绸当作礼物寄给母亲，黄氏写信训诫曰：“此非取之民间，何处得来？吾闻古之廉吏，不持官物一缕，尔奈何以美服污我？我终不肯服，姑存之

以志尔过。自后勿寄寸丝,我心始悦。”黄氏还乐善好施,“至如遇贫病者,辄济以药,所活又不胜纪。盖志在济人,虽患难流离,未尝少怠也”。而在汤来贺“治行推天下第一”^[1],受到明廷赏识时,“恩纶至,戚里为之喜,黄独以国势日蹙为痛,至于泣下”^[1],黄氏心系明朝安危如此。顺治四年,时金声桓反清,向汤氏屡次索贿,诬陷汤绍中至于下狱,汤氏一家逐渐陷入贫困,而黄氏安贫自若,毫无怨言,且怡然曰:“有盛必有衰,尔初捷时,吾固虑有今日;当年不愿富贵,今亦可安贫贱。”^{[19]294}

汤来贺少年时师从黄端伯,黄氏字元公,一作元功,号迎祥,又号海岸道人,建昌新城人^{[20]639}。崇祯元年(1628)进士,任宁波推官,改杭州^[7]。黄端伯为官时遭人诬陷,故弃官归,隐居于庐山^{[15]221},但不改讲学之习,时与王养正等人讲学于白鹿洞书院^{[21]1463},作有《白鹿洞书院语悟》^{[17]526}。国变后为僧,入南明弘光政权任礼部郎中。南京失守,百官投降清兵,独端伯宁死不屈,被杀于市。卒时年六十一,谥忠节^{[22]256}。黄端伯崇慕理学节义,讲学亦以程朱理学为主,其理学思想以及杀身成仁的行为亦给汤来贺遗民人格的形成、对程朱理学的笃信带来一定影响。

汤来贺任扬州推官时,著有《广陵敬慎录》《广陵钦恤录》,任广东按察司佥事时,他写成《粤政存草》《粤东乡约全书》^{[23]98-95},记录与反思自己的为政历程,无愧乎时人于来贺有包龙图、海清天之称^{[17]528}。南明隆武朝廷时,汤来贺任广东左布政使,他从广东走海路运输十万军饷至福建^[24],为隆武帝抗清立下功勋。汤来贺因得罪何吾驺、王坤等权贵,拒绝永历帝之召^{[17]529},从此结束为明朝基业奋斗的为官生涯,而归为遗民。

因汤来贺在地方上享有威望,顺治五年,谭将军委湖东道莫可期赍书造访汤来贺,欲说服他归顺新朝^[24]。另外,降清后又叛清的金声桓、王保仁都曾召请汤来贺,清朝开国重臣范文程、洪承畴亦致书邀其出山。随着永历政权的覆灭,清廷治理天下趋向平稳之时,康熙十三年,耿精忠起兵反清,待汤来贺以重礼^{[17]529},意图利用汤氏在两广的声望,为其起义活动赢得民心。面对清廷臣子、叛清将士的轮番礼遇,汤来贺依然不改遗民初心,在家中潜心著述,以讲学授徒为乐。

汤来贺的两位弟弟亦有一定文化造诣,兄弟们的人生历程亦颇有相似性。汤来贺弟一曰来赓,为康熙八年贡生,选为铅山训导,未赴任,和其兄一样避居乡间,安心著述^[1];一曰来贲,以来贺为师,康熙二十五年贡生,亦不赴任而幽居乡里,以授徒为业^[25]。《民国南丰县志》卷二十七《人物传·文苑二》载来贲生平云:

汤来贲,字敦实,绍中第四子。于书无所不读,《十三经注疏》、诸史百子,皆手自评论。为文不染俗氛,嗜临池水,为之墨,每一纸出,人争宝之。家居,砥行立名节,以孝友称。康熙丙寅贡于雍,尚书李振裕将荐之,固辞。选教职,亦不就。自号拙逸山人。

汤来贲文史积淀深厚,故汤来贺《内省斋文集》文末存有大量来贲的点评语。

江西书院的发达表明江西地域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浓厚的地方文化氛围。汤氏号称江西南丰地方文化世家,具有钻研儒学、尊师重教的家族传统,为子孙后代培育成才打下基础。汤来贺父母为人忠孝,尤其是其母家法谨严,有儒家君子风范。其祖上隐居不仕的先例,以及父母对前朝的忠诚,这类代代相传的家族文化、视功名如身外事的家族理念,是汤来贺入清后保全人格气节、甘愿成为遗民悠居乡间的重要原因。而汤来贺亦不辜负其先祖的教导,成为一方大儒。身为正统儒者的汤来贺,不忘儒士弘扬文化的使命,知晓肩上负有传承圣贤思想的责任,故他几十年坚持亲自解说儒家之道,教化一方民众,使民众践行儒家理念。

三、“正说旁说,无限苦心”——汤来贺之讲学兴教

康熙二十四年,山长汤来贺制定白鹿洞书院学规,学规分为七条,分别为专心立品,潜心读

书,澄心烛理,虚心求益,实心任事,平心论人,公心共学^{[26]119-121}。其一曰专心立品,即教人要做君子而非小人,应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其二曰潜心读书,以四书六经为基本读本,旁通遍览,目的是通达时务,济世安民。且制定具体的读书规则,每月读一书,每读一书要勤于反思总结。其三曰澄心烛理,要摘抄并概括经典中的精髓之句,借鉴彰显古人德行之事,以进行自我警示与观照。其四曰虚心求益,不仅可向师长问学,也可不耻下问,向同辈或小辈询问学术,相互切磋借鉴。五曰实心任事,即以天下百姓之事为己任,学习有用之实学,有志力行。六曰平心论人,提倡宽厚待人,隐恶扬善,行儒家忠恕之道。七曰公心共学,秉持至公无私之心,与人为善,积极奉献。

从所立学规来看,汤来贺强调士人的道德意识,号召士人学习实学以造福百姓,此即孔子以来儒家所强调的求学旨在为天下苍生效力的思想。据其学生干建邦《业师汤文恪先生传略》的文字,汤氏“不剿袭无极、太极之微言,不驰骛登高、远行之绝境,独淳淳以事亲、从兄、谨言、慎行、忠君、泽民,俾各随时,随分努力实践”^{[17]530},讲学时不讲虚无玄远、高深莫测的大道理,旨在鼓励学人砥砺前行,将所学落到实处。汤来贺对经世致用之学的强调,亦是包括汤来贺在内的清初儒学家在改朝换代后,目睹心浮气躁的士风以及部分理学家讲授不切实际的空虚学问的情形,故有意学习治理国家之道,以此表达改善民生的决心和努力。

康熙二十五年,汤来贺八十初度,步入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坚持讲学,士人纷纷作诗文庆贺。“易堂九子”之一的曾灿作《潮阳寄寿汤惕庵年伯八十》组诗三首,收录于其《六松堂集》卷七^{[27]408-409},点出汤来贺生平经历与品格气节,其一云:

潮阳终日撼乾坤,稽首风涛拜晓暾。万里山川开地户,七襄星汉识天孙。(年伯大诞值七夕。)晋庭耆旧年来少,鲁殿灵光乱后存。当日旂常铜柱在,斗杓直欲指昆仑。

其二云汤来贺中年放弃功名为遗民,居家著述事:

名山筑室老青氈,五十勋名久弃捐。天地尚留双眼在,诗书只许一灯传。且看凿齿《春秋》义,不注蒙庄内外篇。从此熊黑应入梦,何须更祝大椿年。

其三云其晚年讲学白鹿洞事:

乱后飘零其梦思,十年两度见黄眉。风云兰谱成三世,樛葛蓬根托一枝。化俗里垂颜氏训,过江人愧卫家儿。身浮韩水归无日,安得乘凫进紫芝?

吴绮作祝寿文《汤惕庵夫子八秩寿序》^[28],以及七言律诗《寿汤惕庵夫子八十》二首^[28],其一云:

紫气遥瞻感倍深,当年曾得荐鸣琴。岁时自老怀人意,陵谷难移知己心。硕果久留宁用采,神芝亲种不须寻。钓璜未是磻溪愿,一曲南飞且共吟。

其二云:

鸠杖婆娑引凤毛,新秋棋墅乐偏饶。客经盱水方知学,人与庐山相并高。河岳日星千古在,皋夔巢许一身遭。侯芭梦到扬亭远,欲寄蓬莱换骨胶。

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以及《十三经》《二十一史》《古文渊鉴》《朱子全书》《性理大全》《周易折中》等儒家经典^{[29]68},以表彰白鹿洞书院对士人教育、文化传播的杰出贡献。而在同年,汤来贺选择告老还乡^{[17]530}。江西新建士人裘君弘在《西江诗话》卷九《汤来贺》一文中,记录其于是年夏天谒汤氏事:“惕庵先生理学大儒,……予以丁卯初夏薄游晋谒。……临别,先生赠诗一章。……时年八十一。”^[30]康熙二十七年,汤来贺去世,他将生命最后的三年光阴奉献给白鹿洞书院。由于其山长一职并非官方任命,是受礼聘而任,大体沿袭了早期书院“主持

者多是积学宿儒,不受朝廷官爵,亦不食朝廷俸禄,此时山长往往采用礼聘”^{[31]100}的选任方式。且清代山长“多为礼聘,一般只负责教学、考课等事务”^{[31]100},无需承担行政管理等任务,所以他的洞主身份与其明遗民身份并不矛盾。故他去世后得不到官方的赠谥,弟子私谥“文恪”^[1]以纪念先师。康熙五十二年,江西巡抚王企请在南丰建“汤惕庵先生祠”^[18],凭吊这位儒学宗师。《民国南丰县志》卷五《建置志下·坛庙》中“汤惕庵先生祠”条云,该祠原“在人字街,……乾隆五十四年县学生汤寅等陈请移建西门外石岭”^[1]。

汤来贺去世后,众士大夫作诗悼之,有诗文可证。四川籍明遗民、书画家吕潜《课耕楼诗集》收录七律《寄挽汤惕庵先生兼答硕人昆仲》:

薄海岂堪遗老尽,尺书远寄百愁生。十年别思萦江水,三世寒交泣杜蘅。东海翱翔余皂帽,西风零落暗青萍。可怜孝子千行字,字字哀猿峡里声。^{[32]86-87}

“岭南三大家”之一、亦以遗民终老的陈恭尹作《挽汤惕庵先生》云:

大雅九云没,中原尚此人。晨星方在望,宿草已逾春。便自成千载,何繇赎百身。唯余召公树,蔽芾粤江滨。^{[33]357}

汤来贺的子孙亦名扬后世,汤氏“祖孙数代于明清之交守节隐逸田间,为弘扬儒学文化做出贡献,为后人景慕”^{[17]526}。汤来贺的儿子汤永诚,字若人,以父来贺荫入国子监读书,为崇祯朝监生。八岁能文,入清后亦成为遗民,著有《云鹤亭集》^[1]。幼子汤永宽,字硕人,天赋诗才,后亦讲学于白鹿洞书院,著有《随遇堂集》^[1]。汤永诚之子汤有年,雍正元年拔贡,任瑞昌训导,其事迹收录于《同治瑞昌县志》卷六《职官·名宦》:

汤有年,字慕韩,南丰人,由选贡授教谕。年逾八旬,目明步健,作诗文顷刻立就。为人谦恭,言笑不苟。家极贫,从游者束修不计多寡,课士以立品为重。曾倡修学署前重三间。后解组归,邑士祖道不忍舍,可谓不愧师表矣。^[34]

汤有年后隐居乡里,可谓继承其祖父以授徒讲学为终身事的宗旨。汤有年之子汤景曾,字晓升,号南村,亦讲学乡间,著《南村遗稿》^[1]。汤永宽子汤椿年,字祚培,贡生,官分宜训导^[25],编著《钟山书院志》^[35]。

四、“文恪”汤来贺的文学声望与社会地位

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天下复归一统^{[36]484}。江西巡抚安世鼎有意推举人才,兴修江西书院,重振江西文化。白鹿洞书院是为天下书院以及江西书院之首,对于江西文化来说有标志性意义。康熙二十二年,以安世鼎为首,偕同江西提学道高璜、广饶南九兵备道查培继、南康知府周灿等主持重修白鹿洞书院^{[17]529}。次年,安世鼎遣人礼聘汤来贺主持白鹿洞书院,汤婉言拒绝。安世鼎深晓“理学经济,隐居山林”^[37]的汤来贺以遗民气节为重的性格,托人劝说道:“此乃入山非出山也,愿公勿鄙此席。”^{[38]541}汤来贺方应允。汤氏于康熙二十四年入白鹿洞书院,任主讲,“立明经蔡植、干特为堂长,以陈彦、李瑋为学长,学者云集”^[37]。

汤来贺受聘之事详载于《白鹿书院志》卷十三《艺文》:

国初,前抚臣蔡士英亦加修葺,近复渐至废颓,遂檄令前任提督学政按察司金事臣高□(璜)^[14],会同布政使臣张所志、按察使臣孙兰、分巡饶九南道副使臣查培继公同计议,专委南康府知府臣周灿鸠工庀材,重为修理。……乃延南丰乡绅臣汤来贺以主洞事,开筵授讲,四方之士负笈而至者以千百计,彬彬乎极一时之盛矣。^[37]

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撰有《白鹿洞山长》一文，记载了白鹿洞书院自建成以来的历代山长概略，亦提及汤来贺受聘事，其文云：

白鹿洞书院创于南唐升元中，……朱文公知南康，学规始备。明代多巡抚督学，礼聘名儒充之。其最著者，胡敬斋先生居仁、蔡希渊宗宪、刘给事世扬、赵给事参鲁、吴明卿国伦、章斗津潢、舒碣石曰敬、李忠毅应升、朱勋、黄佑、蔡为。唐御史龙特疏以兴化府教授改南康主洞席。胡、章、舒皆江西理学名儒。……今当路聘汤惕庵来贺主之。惕庵，南丰人，崇祯庚辰进士。前给事中。今年八十。^[39]

时汤来贺已年近八十岁高龄，他不顾年老体弱，致力于讲学，同时设诸多职事，把书院管理得井井有条。许多士大夫久仰汤公之名，如干特、干建邦父子^{[23]95}，年过七十的湖北籍进士莫大岸等^{[38]541}，他们远道而来，拜汤来贺为师，听其教诲。士人慕贤之切，名儒教授弟子之盛况，遂成江西士林的一段佳话。任职期间，汤来贺写成著作《鹿洞述言》^[37]。

四方名士入白鹿洞谈学论道，汤来贺亦在执教期间与他们有诗文往来。王士禛自记曾入庐山拜谒汤来贺，与著名诗人孙枝蔚、南康太守周灿共游之事：“（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归阻风雨南康，会南丰汤佐平来贺先生来主白鹿洞书院，相约入山，遂与孙处士豹人枝蔚、南康守周星公灿游庐山栖贤、开先诸寺，皆有诗。”^[40]王士禛有《初入五老峰谒白鹿洞，呈汤佐平先生》一首，即此次入白鹿洞书院时呈与汤来贺之作：

忽忽远城市，浩浩临沧洲。良辰惬奇赏，始遂庐山游。威纡屡转壑，窈窕时经丘。潺潺风瀑泻，苍苍石川流。骑牛缅往迹，眠鹿钦前修。风景宛犹昔，年运倏已遒。惟有五老峰，屹立忘春秋。紫芝惊汉帝，黄石招留侯。泉石不我遐，桂树生山幽。^{[41]1190}

从这些传世文献中，可见清初士人对汤来贺的崇敬之情。王士禛等人是亲自登门拜访，更多的士人则以尺牍寄与汤来贺，愈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江西籍士人程作舟《程氏丛书·删后诗》卷三收尺牍《呈汤惕庵先生》：

昔年相遇石头城，古心古貌古先生。先生今为鹿洞长，道学坛中执耳盟。读书会须见性命，岂徒文采夸虚声。光风霁月周茂叔，瑞日祥云程伯淳。耳闻《易》义虎皮撤，心存诚敬江水平。尧夫楼阁今何在，延平秋月为谁明。定夫未免下稍耳，神明内腴集其成。希颜有录真微妙，衍义无篇不纵横。常嗟杜撰空博，须知胡撞说难行。奇奥爬梳皆有益，精深渊海总难倾。古人绝学乃如此，先生为我仔细评。何时坐我春风中，碧绿青黄信手擎。^{[42]37-38}

诗中刻绘汤来贺身为白鹿洞山长，讲学授徒谆谆善诱，姿态横生，讲授内容重在儒家性命道德之学，风姿伟然，亦见其在文学、理学领域声望之高。福建籍士人黎士弘撰《寄汤惕庵先生》一诗，盛赞汤来贺为履行儒士传播文化之责入洞讲学，引领士人走向“正学”之路：

读书与怀人，岂必在接席？譬如望嵩高，引领胜登陟。先生古学徒，巍然树典则。束身践孔姬，奇文走籍湜。缅闻白鹿洞，杖履偶然出。朱陆讼千年，平亭费子墨。近晤潘使君，长笺读屡幅。意拟庇万间，咸得遂生息。仁人言蔼如，古道见颜色。公既大耄年，余亦适杖国。茧足隔山川，何因就公侧。烦公无尽灯，照我有漏识。庄生言多妄，火传薪不息。^[43]

骈文大家吴绮中亦如此赞颂汤来贺：

登临靡懈，郭尚书之龙耳多徵；仁智相资，朱考亭之虎皮足据。乃致邦君登请，来为庶士仪型。缉柳成编，大启横经之席；折松为廬，弘开讲德之筵。遂使负笈云从，儋簪景合。雾屯五里，宁言市比华阴；风动百城，但觉车填通德。何其盛也，不亦休哉！^[28]

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学者跟从汤来贺听讲已蔚然成风,乃一时之盛事。

综上所述,汤来贺晚年任山长,与明末江西讲学之风的盛行、汤氏代代相承的重视教育的家族遗风不无关系。汤来贺在崇祯朝、隆武朝的文治武功,并未使他入清后仕于新朝,相反,他选择保持遗民风节,以向广大士人传授程朱理学为己任。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这也是他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白鹿洞书院山长的内在原因。他的归隐的志节与讲学之习气,亦传给后世子孙,南丰汤氏因之成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化世家。明遗民遭遇天灾人祸,家业萧条,又要秉持君子固穷的伦理要求,放弃功名利禄另寻出路。教书育人成为明遗民常见的治生手段,遗民治生之途,体现的依然是士人身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即传播文化与传承文明。在他们身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苏轼《老子论下》)^[44]的忠贞理念和道德取向,一以贯之。

参考文献

- [1] 包发鸾,赵惟仁.民国南丰县志[M].1925年铅印本.
- [2] 胡适.书院制史略[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9.
- [3] 邬小辉.江右书院行之论文[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
- [4]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江西书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 [5] 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 [6] 李才栋.唐至北宋的江西书院:江西书院史略稿之一[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1982(2):27-37.
- [7] 张廷玉,等.明史[M].四库全书本.
- [8] 索尔纳,等.钦定学政全书校注[M].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9] 允禄,等.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M].四库全书本.
- [10] 许应鏞,王之藩,曾作舟,杜防.同治南昌府志[M].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 [11] 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 [12] 胡迎建.清初江西三大学派歧同述略[J].江西社会科学,1996(12):69-70.
- [13] 钱林.文献徵存录[M].清咸丰八年(1858)刻本.
- [14] 蓝煦,徐鸣皋,曹徵甲.同治星子县志[M].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
- [15] 《江西省志人物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志人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 [16] 谢鸣谦.程山谢明学先生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 [17] 曹月堂.中国文化世家·江右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18] 邵子彝,鲁琪光.同治建昌府志[M].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 [19] 汤来贺.内省斋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0] 江西省黎川县志编纂委员会.黎川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2.
- [21] 祝秀侠,袁帅南.中华文汇·清文汇[M].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
- [22]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江西古代名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
- [23] 张希仁.江西教育人物[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 [24] 孟照,黄佑.乾隆建昌府志[M].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 [25] 刘坤一,等,修.刘铎,赵之谦,等,纂.光绪江西通志[M].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 [26] 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 [27] 陶福履,胡思敬.豫章丛书·集部10[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
- [28] 吴绮.林蕙堂全集[M].四库全书本.
- [29] 王立斌.书院纵横:第3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
- [30] 裘君弘.西江诗话[M].清康熙年间裘氏妙贯堂刻本.
- [31] 李西宁.中国书院与阅读推广[M].北京:朝华出版社,2020.

- [32] 胡传淮,陈名扬. 诗书画大家吕潜[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
- [33] 陈恭尹. 陈恭尹诗笺校:上[M]. 陈荆鸿,笺释. 陈永正,补订. 李永新,点校.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 [34] 姚暹,冯士杰. 同治瑞昌县志[M]. 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
- [35] 金鳌. 金陵待徵录[M].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 [36] 沈起炜.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 [37] 毛德琦. 白鹿书院志[M].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
- [38] 汤锦程. 中华汤姓源流[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 [39] 王士禛. 皇华纪闻[M]. 清康熙间王氏家刻后印本.
- [40] 王士禛. 渔洋山人自撰年谱注补:卷下[M]. 惠栋,注补. 清惠氏红豆斋刻本.
- [41] 王士禛. 渔洋精华录集注:下[M]. 惠栋,金荣,注. 宫晓卫,孙言诚,周晶,等,点校整理. 济南:齐鲁书社,2009.
- [42] 程作舟. 程氏丛书·删后诗[M]//徐永明.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丛部善本汇刊 94.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43] 黎士弘. 诤素斋诗文集·诗集[M]. 清雍正二年(1724)黎致远刻本.
- [44] 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钞[M]. 明崇祯四年(1631)刻本.

The Reasons for Tang Laihe's Life Choices

PAN Haoz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adherents of the former Ming dynasty voluntarily resigned from their posts in silent protest. They earned their own living by teaching and tutoring students. Tang Laihe (1607 — 1688), a high rank official born in Nanfeng, Jiangxi Province, was just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m in the Ming dynasty.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former Ming dynasty, he engaged in preaching the Neo-Confucianism of Cheng Hao, Cheng Yi and Zhu Xi, stipulating the principles for the White Deer Grotto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He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Neo-Confucianism, rule of virtu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e has become the professor of the Academy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his family tradition advocating the scholarship, as well as his belief in Neo-Confucianism, which altogether won him the posthumous title “Wenke (role model of literati)” in his hometown and surrounding areas.

Key words: academies in Jiangxi; family tradition; Tang Laihe; life choices

〔责任编辑:朱 根〕